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系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 孙久文 程芸倩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部署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大改革举措。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既是发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发力方向。

破除区域市场分割,构建地区间社会分工网络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本质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打破国内区域市场分割,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壁垒,是充分发挥我国大国规模优势、培育全国一体化的国内大市场的重要路径。

首先,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在我国各个区域之间的流动,不仅受到自然地理因素的天然阻碍,也客观存在制度层面和观念文化层面的障碍。经过多年的改革,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阻碍大幅降低;加之伴随通信、物流、运输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我国商品和服务要素的市场一体化程度明显提升。但是,生产要素在城市间的流动依旧受到边界效应的显著影响。区域市场分割现象不仅存在于省与省之间,在城市群内部的地理范围内也普遍存在。因此,从区域经济角度审视,我国在消除区域市场分割、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其次,近年来我国的区域壁垒不断破除,区域市场不断整合,但影响区域间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探究如何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合理流动,疏通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堵点,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现实问题。这些堵点包括:一是行政区划带来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行政性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这些行为限制了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二是各地区的市场准入标准不统一。市场准入标准的统一,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三是社会信用制度不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滞后,影响了市场主体的信用交易和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四是地区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均衡:一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公共服务不均衡不充分,这些问题影响了市场的整体运行效率。为了解决这些堵点,需要从制度建设、监管协调、基础设施完善等多方面入手,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以促进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市场的健康发展。

再次,市场的本质在于构建一个社会分工

■区域经济发展不仅要以局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为评价标准,更要在全局资源配置最优的标准下开拓区域分工与协调并重的发展路径,更好地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亟须各城市和区域之间的协调合作与联动,将地方利益与市场整体目标深度融合,使要素在区域之间、城市之间、城乡之间都能够自由流动

网络,该网络有效运行的前提在于确保每个参与者具备公平参与竞争的能力。而地区性“小市场”和“小循环”是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国内市场一体化和超大规模规模优势变得日益重要。因此,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亟须各城市和区域之间的协调合作与联动,将地方利益与市场整体目标深度融合,使要素在区域之间、城市之间、城乡之间都能够自由流动。这样做的依据是:由于各地区在自然资源、资本、人力资源、技术等禀赋方面存在差异,为尽可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客观上需要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来配置资源。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功能进行差异化分工,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度统一和区域间协调发展,以实现全国资源的有效配置。对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应实施有效的转移支付政策,保障这些人口流出地区的基础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能够使这些地区发展符合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顺应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以区域要素流动为核心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价格机制,根据市场力量配置资源会使得生产要素可以根据价格机制进行跨地区、跨部门的流动。因此,生产要素的流动本质上是为了追求最大化回报,而其流向则受到各地区比较优势和要素回报率的影响。如果生产要素在地区之间能够实现自由流动,不仅能通过集聚效应提升生产效率,也有望在区域层面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从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促进区域发展的相对平衡。以劳动要素为例,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劳动力尤其是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向沿海地区和区域性中心城市集聚,促进地区间人均GDP或人均收入的收敛,区域经济格局会自发地向着区域相对收入差距收敛的方向调整。

正确处理区域经济发展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 系,还必须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上述背景下,市场导向的要素流动总是流向高效益地区、高效益产业、高效益企业。从微观角度来看,企业与个体层面的要素流动有助于提高整体资源配置的效率,并且能够持续发掘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减少政策制定与地区优势之间的偏差。然而,单纯依靠市场调节,会将生

产要素过度引向东部发达地区,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中央政府通过政策倾斜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引导一部分生产要素流向西部欠发达地区,也是统一大市场建设不可或缺的。

因此,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亟须各城市和区域之间的协调合作与联动,将地方利益与市场整体目标深度融合,使要素在区域之间、城市之间、城乡之间都能够自由流动。这样做的依据是:由于各地区在自然资源、资本、人力资源、技术等禀赋方面存在差异,为尽可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客观上需要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来配置资源。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功能进行差异化分工,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度统一和区域间协调发展,以实现全国资源的有效配置。对于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应实施有效的转移支付政策,保障这些人口流出地区的基础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能够使这些地区发展符合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顺应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推进策略

依据全国统一大市场下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打造区域分工和区域协调并重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径。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将逐渐消除各领域、各行业的市场分割现象,这将有助于更大范围内、更多微观主体参与的分工协作现象发生,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打破地区间产业结构同质化的局面,利用大中国经济发展的超大规模规模优势。对此,一方面,需结合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深化区域分工,构建优势互补的现代产业体系,减少地区产业布局重复建设、重复引进、“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现象。另一方面,应完善区域协同发展政策体系,通过大区域和跨区域的合作,促进产业、人口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高效集聚。从目前区域合作的基本态势来看,中央主导推进的大区域的合作仍然是最主要的

“两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

□ 董 平

■我们说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极少数甚至是唯一绵延数千年而至今不曾断绝的文化,既不是说数千年前中国文化的原始样态毫无改变地保持到了今天,更不是说中国文化在其数千年的历史绵延中其价值初始内涵不曾发生过历史性变动,而是说,中国文化的原生价值根性总是以不同的样态在不同历史境遇之中获得体现,整体呈现出价值贯彻的历史同一性

的相互观照及其价值维度的交相融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根性才可能得到充分彰显,文化主体性才得以显著挺立,价值的历史与历史的价值才相互交叠而转换出独特的时代性内涵,从而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

“两个结合”是在当代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中重建并彰显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根本方式,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体系之当代绵延的有效途径,是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中国经验的可靠保证。文化主体性的坚持与自觉挺立,是文化价值理念展现为文明形态的核心基础。“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从而真正以独特面貌独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国文化具有2000多年的对外开放历史,更有吸取、转化、更新不同思想文化及其价值理念从而实现文化主体性重建的丰富历史经验,因此也一定能够为当今时代的文明交流互鉴、挺立文化主体性、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积极有效的借鉴。

中国文化的世界性与主体性重建的历史经验

在中国文化自身所形成的叙述传统中,周公的重要性,在于他最能领会由尧舜所奠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之根性,而将之转化为“焕乎其有文章”(《论语·尧曰》)的礼乐文明,从而实现了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为本然目的的制度文明。此后的全部文化史与思想史,皆为“礼乐文明”在不同维度上的义理诠释、思想完善、结构调整与价值重估。礼乐文明的完整体系,是根本的价值理念能够得以实现的公共行为规范体系。

合作形式。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增强城乡经济联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需紧密依托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的顶层设计,建立和完善包括决策、执行、监督、仲裁等功能的跨区域协调机构,完备区域合作制度体系,完善与区域利益和区域经济行为相关的经济规则,有效解决地区间的区域竞争和区域冲突,保障区域合作良性运转。

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防止各地搞自我小循环,打消区域壁垒,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于政府而言,要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稳定、透明、规范、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提供有效保障,减少对行业、地区、所有制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依据《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建立完善市场监管协调机制,提高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执行能力,为企业竞争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高企业和市民的参与度,转变政府职能和定位,注重城市内企业、市民利益诉求的表达和实现,确保政策更加贴近市场需求和民生福祉;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缩小区域间市场化和开放度的差距,发挥要素集聚地区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用制度型开放倒逼行政体制改革,深化市场化改革,形成平等准入、公正监管的规制体系。

提升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对内和对外开放水平,在确保内部要素自由流通的同时,推进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和经济联系,真正建成全国统一大市场。随着区域壁垒的降低,生产要素会自发地向效益更高地区集聚,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的承载力将进一步提高。因此,应基于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等重点空间载体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加强轨道交通、公路网、信息网、物流网的建设,促进基础设施一体化,为要素流动提供硬基础;加大在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治理领域的投入力度,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为要素尤其是人的流动提供软保障;推进在户籍、土地、金融、科技等关键领域的配套改革,促进市场一体化,为要素流动营造良好环境;开展简化行政审批流程、统一审批标准的试点工作,扫清行政准入市场、参与竞争的制度障碍。在此基础上,支持区域间资源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合作机制,积极总结推广成功经验,通过地区间的分工协作实现全国层面的规模效应。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价值理念得到时代性更新,本来就是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不断面临的问题。对以佛教为主要形式的外来文化的同化与转化就是典型案例。佛教自公元一世纪开始整体传入中国,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佛教典籍的大量翻译、义理注疏及其宗教知识的体系化重构,天台、华严、三论、唯识成为最为显著的四大佛教义学体系,佛教已然实现了“中国化”。而禅宗的出现在信仰的实践意义上真正诞生了“中国佛教”。尽管如此,在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公共价值理念及其生活实践层面上,佛教仍然会与以儒学为主要形态的中国固有文化发生冲突,文化与价值的主体性问题是因此而彰显。从历史的思想逻辑来看,正是有鉴于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的失败,同时又深刻意识到韩愈关于“道统”传承断灭的忧虑,及其“举尧狄之法而加之先王教之上”而致导中国“胥而为夷”(《韩昌黎文集·原道》)的忧虑,才有了宋代的理学建构。理学被称为“新儒学”,它超越了“汉学”的知识习得,在价值观念上以回归孔孟为号召,在学问目的上以成为圣人为倡导,在历史理念上以继承圣学道统标榜,重构了儒学的全部观行体系,重置了信仰与实践、价值与生活、本体与工夫、形上与形下、先天与后天等一系列关系,从而完成了解构佛教的文化目的,重新彰显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及其价值根性。无论是慧能“中国佛教”的开创,还是“新儒学”体系的建立,实质上都是在特定时代条件、文化语境之下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今天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文化史上重建主体性的历史经验依然是重要的思想资源。

今天,随着日常生活的不断开拓,随着与世界不同文明交往的不断深入,主体性仍然是个问题。“两个结合”为文化主体性的重建指明了方向。重新彰显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是当今时代的重要课题。只有通过“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实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才能获得滋养而焕发新生,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会因马克思主义的融入而获得新的时代性,并在一个更为广大的文化背景下体现主体性。我们可以期待,在中国人民富有创造性的实践之下,在同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之下,中华文明必将开启新的时代华章。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学院)

随着中秋佳节临近,节日气氛愈发浓烈,特色月饼走俏市场,文旅消费日渐升温,各地纷纷策划推出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中秋活动,彰显出传统节日的独特生命力。传统节日有何当代价值?节日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关系如何?具体可以有哪些传承和创新路径?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早在2005年,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和文化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其中提到“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肯定了传统节日的当代价值。对内,传统节日可加固民族的文化记忆,增强国民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对外,它们则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一系列标志性符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可以凭借的有效途径。

从社会和民众的角度来看,传统节日一方面可以调节紧张繁忙的日常生活,让身心得到休息;另一方面也为人们加强社会联系、增进家族情感提供了契机。尤其是在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时间节奏越来越紧张的当代社会,通过节日期间的心境转换和仪式性的社会交往,如春节返乡走亲访友,清明节为亡故的亲人、祖先扫墓,中秋节阖家团圆,重阳节关怀问候老人等,可以增进家庭感情、塑造和谐的社会风气。而节日期间也是小商品市场、旅游业、餐饮业消费的高峰期,探亲访友催生消费需求,年货、粽子、月饼、鲜花等商品在节日期间的销量往往水涨船高,而随节日而来的假期也是出游旺季,对于地方文旅而言是重要的机遇。对于个体而言,传统节日也是享受生活、体验幸福感的好时机。节日团圆、祥和、欢乐的气氛能使人身心得到放松,同时,传统节日的精神内涵,例如春节辞旧迎新、感恩天地的文化意蕴,清明慎终追远、尊崇祖先的人文情怀,端午清洁卫生、燎灾祈福的健康意识,中秋家庭团圆、幸福美满的理想追求,都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激发人们的生活热情和对于未来的希望和向往。

传统节日的传承并不意味着照搬旧俗和死守成规,而是必须适应新时代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在保留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随着时代变迁,今天,不少传统节日的主题、功能和节俭已经发生了重建建构。例如重阳节,过去称“重九节”“晒秋节”“登高节”“茱萸节”等,主要功能是庆祝丰收、辟邪消灾、祈求长寿。汉代笔记小说《西京杂记》中有记载:“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唐代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也显示古代重阳节的节日主体并非只有老人,而是社会全体成员。今天,在“敬老孝亲”的倡导下,重阳节逐渐成为老年群体的节日,寓意高洁和象征年寿的菊花也变成了这个节日的标志符号。七夕过去是属于女性的“乞巧节”,在当代,与西方的情人节相对应,七夕逐渐成了中国的情人节,不少地方都会在此时策划相亲大会和其他爱情主题的活动,这一节日的本色也逐渐褪去。当然,更多的节日是在保留其原有主题和功能的基础上,对一些节俭进行创新性发展,如今年上海春节期间的庙会,通过市集、庙会、民俗体验等活动,彰显非遗文化、沉浸式国风体验、趣味互动于一体,商家、艺术家、非遗手工艺人加盟,共同打造出了传统文化与商业促销及现代技术融为一体新型庙会,既渲染了春节氛围,又极大促进了节日消费。这些对传统节日的创新,其实依然遵循民俗心理逻辑,既反映了当今时代的价值取向,也体现了民众的文化认同。例如将七夕节建构为中国的情人节,是提取了与该节日密切相关的女郎织女传说中的爱情主题并加以放大;重阳节的建构,也顺应了关心关爱老年人的社会需求,又巧妙应用了传统习俗中的菊花元素,并注入新的文化内涵;春节庙会的新花样,则体现着文化、技术、时尚潮流、社会心态的新发展。

由此可见,对传统节日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当代人的审美口味。正如“年味”的变迁,过去的农历新年,会祭拜神灵和祖先,燃放烟花爆竹,现在改成了观看春晚,组织“村晚”或其他表演活动;过去讲究请客和大吃大喝,有的地方会挨家挨户地从初一一直吃到十五,现在改成了团拜或小群体的聚会;过去要给人磕头、当面给红包,现在改成了发送祝福短信和发放微信红包等等。今天的一些过节方式,可能在现场仪式感方面有所减弱,但这与现代人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发生的改变密切相关。推动传统节日的传承创新,就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设计一些能够吸引人氣的节日活动,让人们过节的热情获得更多释放的场合和机会。节日创新的具体路径首先在于政府的重视和政策支持,其次则需要专家的智力支持,以及商业、旅游业、传媒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例如南京市政府就于2019年制定了《“我们的节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南京行动方案》,并专门成立了节日工作室,聘请相关专家对地方节日的振兴与发展进行调研和开发,提出了“一区一节一品牌”的推荐方案,结合各地的地方特色,开展各具特色的节日活动,如春节在玄武区、溧水区重点打造“明故宫里过大年”“秦淮源头中国节”活动,元宵节在秦淮区、溧水区打造秦淮灯会等。各地需做好文旅融合文章,探索挖掘本地特色的文化和民俗资源,开展特色节庆活动,传播传统节日的魅力,展现文化精髓,通过传统与创新相结合,让传统节日更具吸引力,让传统文化民俗与现代生活交相辉映。

总之,创新性地用好传统节日这笔文化遗产,就是最好的传承。我们应主动地去发掘和建构节日文化,赋予其时代魅力,以彰显传统节日的当代价值。(作者系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让传统节日焕发时代魅力

□ 王霄冰

“两个结合”与文明新形态

“中国文化”不只是一种关于文化的观念体系,更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样态。我们说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极少数甚至是唯一绵延数千年而至今不曾断绝的文化,既不是说数千年前中国文化的原始样态毫无改变地保持到了今天,更不是说中国文化在其数千年的历史绵延中其价值初始内涵不曾发生过历史性变动,而是说,中国文化的原生价值根性总是以不同的样态在不同历史境遇之中获得体现,整体呈现出价值贯彻的历史同一性。“中国文化”的历史绵延,其实质便是一种独特的价值理念体系通过独特的文明样态得以呈现的历史过程。

“两个结合”是重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方式

历史的绵延性与其展开的阶段性是统一的。绵延的实现,正须通达时代之变,基于过往制度与经验之损益,明其因革之理,实现“时措之宜”。中国传统文化通常认为,“六经”虽是载道之书,但“六经”本身只是“器”而非“道”,真正的道体实存于“天下事物、人伦日用”之间。换句话说,一种文明的历史形态及其价值,需要在生活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反观、总结、阐释,展示自身的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式。“第二个结合”充分彰显、强化并巩固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两个结合”是在当前特定背景下的“时措之宜”,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体现。基于“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因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社会实践而被转换为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丰富资源,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融入而实现了现代性转变,在与不同文明体系相互借鉴、观照的独特视域下进一步彰显其世界性面向。正是通过多元文明视域